



## 人物介绍:

王文采,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26年6月5日生于山东济南。194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事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和植物地理学的研究。对被子植物的一些重要的大类群,如毛茛科、苦苣苔科、紫草科等进行了深入的分系统学及系统学研究,共发现20个新属,540个新种。在深入研究许多植物现代地理分布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植物区系中的16个间断分布式样。根据对我国96个科植物分布区的分析、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分布式样和3条迁移路线,并提出了“我国云贵高原一带可能是被子植物的发展早期在此形成了发展中心”的论断。王文采主持的、全国共有130位专家编著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荣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还获得了中科院等部门多项奖励。共发表论文100余篇,著作10部。

## ■本报记者 陆琦

中国的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我国植物分类学家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比如:经过40多年、四代人共同完成的80卷巨著《中国植物志》,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具有科普及研究价值的工具书《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在这两项工作中,有一个人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投身植物分类学研究60余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

只要一和人说起植物,说起出外考察的经历,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就兴趣盎然。尽管早已没有了科研任务,可他仍割舍不下倾注了一生心血的专业,“除了一周去趟标本馆,其余时间都在家研究,希望多少做点工作”。王文采说。

## 王文采:摸清祖国植物家底

## 两位恩师功不可没

1945年,王文采从北平第四中学毕业,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他对植物分类学产生兴趣,是源于大三时的植物分类学课。

“大三开植物分类学这门课,由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林榕先生任教。那时候,我还没对分类课特别有兴趣,就觉得他讲得挺好。”王文采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林榕讲课的时候,一手拿着植物标本,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绘图,讲述有关植物的科、属特征。

1948年5月初,林榕第一次带全班同学到玉泉山野外实习。那一次的实习给王文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花的紫花地丁、蒲公英……林老随手拿起开花的标本,讲这个植物所代表的科属特征、花的构造。我特别佩服林老,什么植物他都认识。”

受林榕影响,王文采常在暑假独自到郊外跋山涉水,八达岭、门头沟、西山……采集了许多标本,并就地绘出许多植物的外形图和花部构造图。

王文采采了不少灌木、草本植物的标本,遇到问题就跑到林榕家里,请他鉴定标本。“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编写《福建植物志》,壳斗科、樟科等科的文献、笔记都是手抄的,一大堆。画图、写字都很漂亮,我非常钦佩他,是他将我领入植物分类学这一研究领域的。”

如果说林榕把王文采领入了植物分类学的大门,那么胡先骕先生将王文采真正引入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之路。

王文采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了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担任动物分类学、生物技术和普通生物学三门课的助教,而非他最喜欢的植物分类学。

194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从内地回北京,同时任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兼任教授,担任他助教的恰巧是王文采的师兄王福全。王福全知道王文采对植物分类一直很感兴趣,他热心地将王文采介绍给胡先骕。

1949年初冬,胡先骕把王文采找去了。当时的场景,王文采还清晰记得。

“胡先生说话有点儿结巴,他说:‘我听说你对植物分类学有兴趣,你帮我编一本《中国植物图鉴》,你觉得怎么样?’我听了特别高兴。胡先生还让我找静生生物所标本馆负责具体事务的总管理夏伟珉先生领稿纸,还派景天科专家傅书温先生把5000种植物的一个名录给我送到师大。”

其实那时候,王文采只有大三时植物分类那点儿知识,还没学过植物学拉丁文,植物分类学的文献看不懂,考证的方法也不懂,《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也没学过,根本没有编一本《中国植物图鉴》的能力。但是,他就是有兴趣,硬着头皮到静生生物所看标本。

不久,中国科学院成立,静生生物调查所的

植物部分、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和上海生物科学社植物部分合并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在胡先骕的极力推荐下,王文采从北平师范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开始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生涯。

## 野外考察乐在其中

作为一位植物分类学家,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王文采一直致力于野外考察工作,先后到过广西、云南、四川、湖南、江西等省区,曾深入到许多人迹罕至之域,获得大量第一手研究资料。

“第一次去野外调查、采集标本是在1950年。”王文采记得当时刚调到植物所,所里决定编写《河北植物志》,为了编写此志需要采集早春开花的植物标本。1950年至1951年间,王文采曾先后到上方山、百花山、小五台山、雾灵山、六里坪等地采集。

1953年,全国范围的综合大考察开始了。1953年4月到11月,王文采和李世英等人组成广西队到广西南部考察橡胶宜林地。

“参加广西队考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南下过长江到达华南,在汉口下火车乘渡轮过江,那时武汉长江大桥尚未修建,看到清澈东流的浩荡江水,不胜激动;到广西后见到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真是高兴;最使我高兴的是在龙州大青山山谷中,第一次见到了茂密的热带雨林,令我兴奋不已。”现在回想起来,王文采还很兴奋。

在那次考察中,王文采要协助队长李世英搞好宜林地调查,并负责撰写报告,还有不少植物群落调查工作,任务繁重,但他还是尽量挤出时间,解剖一些热带植物科、属的花,并尽力绘图。

1954年,王文采又到江西武功山进行采集和植物群落样方调查工作。“这次在武功山考察,如同在广西龙州大青山首次看到热带雨林植被一样,我第一次看到我国亚热带中山地带的以樟科、壳斗科植物为优势种的常绿阔叶林,眼界大开。”

1955年,中苏云南联合考察团成立,两国科学院的动植物研究人员合作考察云南的生物区系。植物区系调查区域选择在云南东南部屏边大围山一带。

“看到这么丰富的植物区系,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绝大多数树种以及灌木、草本都不认识。”王文采向记者描述,山谷中的热带雨林极为茂密,其层次感结构和植物种类,比1953年在广西大青山看见的丰富复杂,低山坡上散生的高大的董棕,形成了一种独特景观。在雨林中,多数高大乔木都有光滑、浅绿色的树干,枝下高度很大,很难攀登,向上望去,不要说花果,就是叶子的形状也不容易看清楚。后来到大围山,一天夜里大雨倾盆,在全队下山途中,经过来时走过的一段二三百米的山谷,只见原来茂密的森林已全部被冲到山谷中,树干杂乱地覆盖了整个山谷。

看到这种景象,对大自然的巨大威力,大家感到一种未曾有过的恐惧。

“野外考察很多时候是非常危险的。”1958年11月,在云南勐腊热带雨林考察中,王文采不幸得了恶性疟疾,连续高烧,只好返回昆明,住进昆华医院。到12月,他病势越发严重,多日高烧不退,吃药不见效。在这危急时刻,昆明植物所四名青年同志为王文采输血1600毫升。“这一大罐血输到我体内后,体温才逐渐降下来,也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从1950年春开始野外调查,数十年间,王文采多次到达我国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区考察植物区系,尤其在西南山区看到不少能挺过冰期子遗下来的活化石种类。“我没有去过新疆天山、内蒙古,很想去看看那里的植物区系,但现在身体不允许了,实在遗憾。”王文采说。

## 学术研究志向不变

1953年,由植物所分类室主任汪发璜提出编写《中国主要植物图说》,以解决全国鉴定标本的需要,并决定先编豆科和禾本科服务农业。汪发璜和唐进两位单子叶植物专家放下了兰科、百合科等科的研究任务,亲自领导豆科的编撰。分类室的全体人员都投入到此项工作中。与此同时,全国搞禾本科的专家都集中到南京大学,由禾本科专家耿以礼牵头编写《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的禾本科部分。

“那时候大家都是全力以赴,尤其是汪发璜和唐进两位老先生做的工作最多。但1956年,两位老先生离开了分类室领导岗位后,《中国主要植物图说》就流产了。”

王文采补充道,1955年《中国主要植物图说·豆科》出版后,《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的蕨类部分单出了一本,1958年出版了《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禾本科》,共出版了三本。

1958年,商业部和中科院联合开展全国野生经济植物大普查,还有一些大学教授提出在10年内完成《中国植物志》的编著。随后,中科院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纂委员会,全国从事分类学研究的专家都投入到《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工作中,包括王文采所在的分类学室。

“实际上,编写植物志需要长期的积累,《中国植物志》的多数科都很复杂。像杏仁昌先生编写的第一卷,那是多少年的积累。”王文采说,“分类学有两个基础条件——文献能否收全,标本能否收全,都不容易做到十全十美,而且分类学有不少类群难于区分,困难的问题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解决的。”

1965年初,植物所分类室抽出10个人,脱产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王文采和崔鸿宾、陈心启组成领导小组,由王文采负责。“他们俩主张采用图鉴的规格;我主张采用图说的规格,就像植物志、附检索表,好找区别特征。争论了好久,最终我妥协了,就用了图鉴的规格。”

## 李云飞:万物唯度

## ■本报记者 郭勉愈

2010年4月的一天,春光明媚,北京玉渊潭公园内樱花盛开。许多游人一进公园便被悠扬的琴声吸引。原来是一位中年人正在弹奏古琴,他的身后悬挂着十几幅书法作品,字体极富特色,每一笔都像是一片竹叶。

2011年早春,京城瑞雪纷飞。到紫竹院公园欣赏赏竹的游客们看到,在白雪覆盖下的青翠竹林里,一位身着红色唐装的中年男子正在抚琴。琴声空灵,古琴、雪竹构成一幅优美的图景。

这位在樱花下、竹林里弹奏古琴的雅士名叫李云飞,笔名度知,是度学的创始人。虽然他的身上富有古典文化气质,然而从事的工作却是宣传普及现代科学——他是北京市海淀区科协的常务副主席。

今年2月份的一天,《中国科学报》记者来到李云飞的办公室。办公室布置得古色古香。右手靠墙是一长排书柜,摆满了书。正面茶几上放着吧台、茶洗,造型古朴生动。办公室中间是一张宽大的画案,陈设着文房四宝。左手沙发边是一丛盆栽竹子,姿态清奇。四周的墙上悬挂着李云飞的书法与绘画作品。

李云飞思路敏捷,十分健谈,说起自己创立的度学以及自己热爱的科协工作来滔滔不绝。

## 学问与书画

大学毕业后,李云飞长期在海淀区委、区政府工作。也许是和哲学出身有关,他习惯于从哲学的思维和视角来看待当前的社会生活。通过长期的研究、分析,李云飞总结出了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思想和见解,在融合传统的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学精要的基础上创立了度学。

李云飞解释说,度学是关于阐释度的本质及把握度的规律和方法的哲学,是关于动态平衡、和谐的哲学新说,是境界论和方法论。度学的核心是提倡“万物唯度,万事唯度”。度的路径或者主线是“适度”,“一切以适度为上,一切以适度为优”。

李云飞对“度”的定义是:“维系事物自身平

衡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使之良性互动并达到统一的存在。”这个定义包含四个层面的意义:度是动态平衡;度是自动调适的过程;度是觉醒的境界,即事物对自身运行状态的清醒认识;度是“度场”,在“度场”中,多种事物和谐相处,形成共同体,以系统整体的高级状态运行。

在李云飞看来,人类遇到的一切问题尽管领域不同、性质不同、千变万化,但都可以归结为对“度”的把握,度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概念和哲学思维,它体现着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境界。一旦人们对度的把握上升到自觉状态,人性的自我开发、自我管理、自我经营的自由之门被真正打开,人们需要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人生的动态过程中去,以自新、变化、发展的态度看待一切,在动态中不断寻求、实现新的平衡与和谐,善于换位思考、多角度思考,保持“大度兼爱”的境界和处事方式,实现共生、共存、共幸福。

李云飞的观点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肯定。李羨林称“度”的思想为“天人合一”。张岱年题词:“祝李云飞的哲学给人类社会带来和谐与愉快。”杨振宁的题词则是:“我感受到了度的极大冲击力。”

很多科学家也认为,李云飞的度学为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在“度学与文化强国”论坛上说,目前城市的发展速度太快,城市环境失去了平衡,这就是发展过程中没有掌握好“度”。王码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则认为,“社会生活中存在很多失‘度’的现象,只有在各方面自觉把握好‘度’,国家才能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在创立学说的同时,李云飞积极探索其哲学思想的艺术化表达方式。因为从小喜欢书画,他自然而然地通过书画来寄托情怀,进而独创了度体书法。

李云飞把竹叶的形状巧妙地融入书法中,每一笔画如在微风中自然飘动的竹叶,潇洒自然,自成一体。李云飞告诉记者,自然界万物是最好的老师,他多次深入竹林,仔细观察竹叶的动、静,形神与状态,也游历了很多地方,师法自然。通过长期的练习与揣摩,他终于掌握了竹叶形态的基本规律。“现在拿起笔来,竹叶

便浮现眼前,可以得心应手地写出一个又一个的竹叶字来。”李云飞说。

除书法外,李云飞的画作也多以竹子为表现对象。他酷爱竹子,以竹为师长,以竹为知音。在《度家度语》里,李云飞写道:“竹子清静自然,愉悦人性,可以使人避免陷入僵化凝滞与扭曲狭俗,坚守自我更新、大度兼爱之本心;它中通有节,直立不挠,可以使人规避放纵与无度,坚守持度守正之本心;它卓尔不群,唯为大雅,可以使人抛弃庸俗,坚守归真自适之本心;它纹理清晰,可以使人辨别是非,坚守明理自觉之本心;它直上云霄,可以使人解除自我封闭与消极悲观,坚守境界高远、志天光明之本心;它动静合一,历冰雪而繁茂,经风雨而潇洒,可以使人达观向上,坚守平衡自适于万物之本心。”

李云飞对书法、绘画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许多人对书画艺术有认识上的误区。一是期求成为名家;二是认为只有通过临摹才能学好书画;三是缺乏亲自尝试的勇气。书法绘画要想走出误区,就必须要有创新。一个人之所以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关键在于个性,书画艺术要体现出自己的个性。一味临摹别人的东西,实际上是在抹杀自己的创造性。

## 将度学运用于科协工作

李云飞随时随地把度学思想运用到科协的工作中。他认为科协的工作应立足四个方面,一是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二是推动科技与的结合,促进区域自主创新;三是为区委、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的建议和科学的论证;四是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科普是科协的“主业”,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李云飞很重视科普过程中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度学的主导思想之一在于发现自我,即:人性的自我开发、自我管理。李云飞认为科普的最终目的是使公民更加重视自身科学素质的提高,并将其变为一种自觉行为,从而实现自身人性的张扬和舒展,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创造激情。

从这一点出发,李云飞常常强调人文关怀与文化视野。他认为,应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

人文关怀,建立和完善科技工作者利益表达机制;同时也应该通过多种人性化方式,建立区域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金融机构、高新技术企业与市区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

李云飞强调以文化的眼光理解科学,从文化的角度定位科学。他认为,中关村应该打造科学文化品牌,创造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文化氛围。他曾建议将海淀公园建设成科学文化公园,在全区主要大街、显著地带建立科学家雕塑。

2009年,由李云飞创意,在中关村建立了一座“科学之光——科学家手印事迹墙”,上面有64位院士的铜铸手印、事迹及科学家名言,每年吸引上万名游客前去参观。谈到这件事,李云飞略带得意地说,这是他到海淀区工作以来做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之一。

度学的宗旨之一是追求万物共生、共存,以系统整体的高级状态运行。李云飞把这一思想运用到工作中,强调各方科普资源的整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科普事业。

李云飞认为,应积极组织动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普力量和科普资源,建立科普大联盟,就科普规划、科普设施建设等重大问题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区域性科普信息平台,编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高新技术企业对公众开放的“开放日”系统工程,并建立长效机制。

从度学出发,李云飞对创新也有独到的认识。他说,人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要善于自新,自新的方式之一就是创新。因此他非常鼓励人们积极进行创造发明。他认为,展示创造发明,把创造发明转化为现实,是愉悦人性的方式之一,有利于激发全民的创新活力。

在李云飞的推动下,海淀科协努力创造一种全新的科协文化,即以科协组织为文化创造主体和影响力主体,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核心价值,以整合社会各界人、才、物等资源为载体,以满足人民群众科学文化需求为出发点来推动科普事业的动态过程;同时致力于增强海淀科协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使海淀科协成为科技工作者之家,从而更进一步提高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热情。

李云飞认为,当前全球正进入一个新的大



## 人物介绍:

李云飞,北京市海淀区科协常务副主席,哲学家,书画家,度学创立者。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2004年获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升乡党委副书记,香山街道、中关村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海淀区委区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海淀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海淀区委常委、北京市科协常委等职。哲学专著有《度》、《度家度语》、《度学》、《度经》。书法专著有《度知墨迹》。

调整、大变革时期。各国都在依靠科学技术创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的争夺。我们如果能够顺应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公理,保持自然的动态平衡,将对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强国和文化大国起到促进作用,“一个强大的中国需要大哲学、大文化、大智慧。”李云飞说。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李云飞告诉记者,由他倡议、海淀科协主办的首届中关村“奇思妙想”博览会将于今年举行,届时将展示科技团体、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社会公众在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好创意、好设计、好发明。

李云飞微笑着,似乎在憧憬着中关村、海淀区科技文化繁荣的未来景象。